

中国历代名诗 分类大典



●主编 胡光舟 周满江

●编注 张明非 李有明 樊运宽 杨福廷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天象自然 江河湖海
山川田园 四时寒暑
岁时节序 花草果木

1

序

王运熙

我国古代的诗文总集，大多数采用以下三种编排方式：一是以作者为主，二是以体裁为主，三是以题材为主。以作者为主的，如殷璠《河岳英灵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等都是，把同一作家的作品编选在一起，便于了解各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以体裁为主的，如郭茂倩《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十二类，姚鼐《古文辞类纂》把古文分为论辩、序跋等十三类。明清时代的诗歌选本，则多数把诗歌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几大类，各类中再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如李攀龙《唐诗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以至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等都是。这类总集，便于读者分体揣摩，掌握其体裁特色。按题材编排的，其起源颇早。如萧统《文选》，先是按体裁把作品分为赋、诗、骚、七等三十多类，其赋、诗两类，因作品众多，再按题材分成小类。其中诗歌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等二十三类。以后宋人编《文苑英华》遵《文选》体例，把诗歌分为天、地、帝德、应制等二十五部，采录繁富，规模就颇为庞大，带有类书的性质。诗歌总集是以题材为主编排的，唐初即有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三十卷、郭瑜《古今诗类聚》七十九卷，唐后期又有顾陶《唐诗类选》，俱见《新唐书·艺文志》，惜均不传。明代张之象编有《古诗类苑》一百二十卷，《唐诗类苑》二百卷，卷帙浩繁，采集广泛，故《四库提要》（卷一九二）称之为类书一流。

这种按题材编排的总集，便于读者按内容题材的需要寻检有关作品。

按题材编排的诗歌集，有它的特殊用处。一是把属于同一内容题材的篇章编集在一起，提供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带有工具书的性质。唐代类书《初学记》于每一专题下常附有关诗作，《艺文类聚》选诗就更多了。其后的类书也常常选录有关诗文。张之象的《唐诗类苑》等可说是诗歌方面的类书。二是在封建社会中，文人作诗之风普遍，他们读前代诗歌，主要是为了向它学习取法。当他们写某种题材（如咏菊花）的篇章时，翻读这类总集，对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都有启发借鉴意义。宋人还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大概也是为了便于揣摩学习杜诗的写作艺术。

建国以来，出版了不少古代诗歌选集，它们几乎都是以作者为主编排的，这诚然是我们今天学习接受诗歌遗产的主要编纂方式。但是，我们也需要其他编纂方式的诗歌集。以题材为主的诗歌集，上面提到的检查专题知识、创作借鉴两点，在今天也还是有其作用。譬如我们碰到端阳、中秋佳节，想看看古人在这方面有哪些优良篇章；或者进一步自己也想写诗，想从古诗中得到启发借鉴，那这种诗歌集就很有用了。这种诗歌集甚至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有用处。同一题材（例如田园）在历代诗歌中的表现和发展情况怎样，也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对象。当然，专门研究需要依据大量的作品，这种诗歌集所选录的一般不会多，但它们至少也提供了进一步探寻的线索。至于就同一题材的不同作品提供比较欣赏的佳篇名作，那更是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

胡光舟、周满江同志主编，张明非、李有明、樊运宽、杨福廷等同志编注的《古诗类编》，按题材分类选编自《诗经》至近代诗歌，分二十二大类，三百多个细目，选诗两千七百多首，并作了较详注释。它继承了古代这类诗歌集的传统，同时根据今天

的标准和需要,对古诗进行分类和选择,是一件很有意义、对古诗爱好者很有裨益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文艺园地由于认真贯彻了“双百”方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广大读者求知欲旺盛,读书蔚成风气,需要各类品种的图书。在古典诗文集方面,读者需要有以作者为主编排的集子,也需要有以题材为主编排的集子。此书的出版,是建国后诗歌选集的一项新的成就,相信它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将会对古典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1984年10月

自序

两年前，我们接受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委托，编纂这部《古诗类编》。目的在于分门别类地向现代读者介绍我国古代诗歌的精华及其概貌，并作为普及性的工具书，使读者易于查找。这是一项相当吸引人却又不易入手的工作。经过一年八个月的努力，现在这部书稿已经完成，其得失毁誉在出版问世后自会有读者的公论，不需自我饶舌。这里只想谈谈我们在编注过程中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本书名曰“类编”，自然要在古诗分类和归类方面下功夫。

“类”这一概念，属于科学的范畴，包融了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归纳、演绎、综合等等的丰富含义。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的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建立了植物分类学，开创了近代科学的新局面，在自然科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我国明代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也是对各种可以入药的生物、非生物进行归纳归目的研究，才写出了不朽的巨著《本草纲目》。分类、归类可以说是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文学研究也是一门科学。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除了创造出“诗话”、“词话”这种独特的方式外，还有一种不同一般的方式，其作用和价值并未得到研究者应有的评价。这就是以类相从，根据题材编纂古代诗文的方式。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大量的类书相辅而生，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古代类书已经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重视，如宋初编集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四大类书，

影印精装，巨制煌煌。这些书当时虽然系奉诏应制编纂，而且常为科举仕进所用，但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并不以“兔园策”或“敲门砖”贬低其价值。可是古代的类诗类文，则依然冷落如故。

我们编注这部不大不小的《古诗类编》，于古虽其来有据，而于今则事属草创。斟酌类目，选诗编诗，既不能完全脱离约定俗成的传统轨道，又必须依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和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加以变通创新，走出一条思想艺术标准相统一，古为今用，雅俗共赏的新的编选路子来。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有传统的诗教，诗以言志，诗以抒怀，自不消说。象传说中行人振木铎采风以观民风；春秋时期诸侯大夫即席赋诗的“断章取义”；汉武帝成立“乐府”以采集“赵代齐楚之讴”，谱入乐曲，用于宗庙祭祀、朝会宴享、军旅凯旋、外交大典；自此以下，一直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中国诗歌的作用真是大矣哉。到了唐代，诗歌的社会应用价值更得到空前的扩展和提高，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任何时代所罕见的。与以诗取士的制度相辅相成，诗人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可以靠诗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用诗，行卷求知己以打开终南捷径用诗，送人出使、还乡，慰人贬官、下第也得用诗。悼亡哀挽，嘲戏讽刺，以诗代简，以诗传情，灞桥驴背，御沟红叶，歌妓乐工旗亭演唱，牧童牛背无腔信口，诗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题材焉能不广，功能怎会不强？春秋时孔夫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或许只是在上层公卿大夫中才有针对性。而到了唐代，孔夫子的话似乎真的成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成文法。唐代的这种风气，在以后的朝代中仍然不绝如缕，绵绵悠悠。

正因为如此，中国诗歌所反映的题材之开闢，内容之丰富，应用范围之广大，主客观结合的社会意义之深远，在世界文学中罕见其匹。古代以类相从的诗歌编纂方式之所以产生尽管有多种

原因，但如果没有这块丰肥肥沃的题材土壤，它要深深植根并得以久远流传，那还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编纂方式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总集、选集可以采用这一方式自然不足为奇，而竟然连别集——如杜甫和苏轼的集子也有以“分门别类”形式出现的，就不免使人刮目相看了。

类诗的编纂，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文选》先是按体裁把作品分成赋、诗、骚、七等类，由于其诗、赋两类内容繁富，数量众多，于是再按题材内容分成补亡、述德、劝励、献诗等细目。北宋前期李昉、王钦若等奉太宗、真宗之命，以国家力量編集“四大类书”，其中《文苑英华》一千卷收录诗文，是词章的总集。它遵《文选》体例，分成天、地、帝德、应制等二十五部，辑集由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以上续《文选》。采集宏富，泱泱大观，为以后《全唐文》、《全唐诗》等的编纂所取材，对于今天的文学、历史研究仍然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代陈梦雷原辑、蒋廷锡重辑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如“博物编”分艺术、神异、禽虫、草木四典。每典又分若干部，每部先汇考，次总论，并在“艺文”一栏中搜罗历代诗文词赋以充实之，便于读者按内容题材查阅检索有关作品。

至于历代私家著述中的类诗别集和选集更是屡见不鲜。目录学家若注意及此，或许还是一个研究的好课题。王运熙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序文中已有述及，此不赘录。

编选按题材、内容分类的诗歌集，不仅象编选按作者、体裁为主的诗歌集一样，要在取舍别择中体现编选者的文学观点、欣赏趣味和眼光识见，而且还要在类目的确立，入选诗篇的历史连贯，以及同一类目中兼顾不同时代流派、风格和写作手法的作品，以尽可能反映该类目题材范围的多侧面，为读者提供鉴赏上可资比较的材料和必要的专题知识等方面作出努力。因此，编选

类诗比起编选以作者、体裁为主的诗选来，似乎还要艰难几分。特别对于入选求精，数量有所限制，不能兼容并蓄、细大不捐的类诗选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在编注本书时，想尽量体现出比较性、欣赏性、历史连贯性和一定的工具性。这正是从类诗选本所可能发挥的长处而作出的考虑。

所谓“比较性”，指的是把同一题材或同一主题的作品有所选择地编排在一起，使读者在比较揣摩中获得较深的理解和更加强烈的印象。这部《古诗类编》，我们力图 and 古代一些“类聚”、“类苑”诗选一样，每类、每目所辑诗篇，都是经过必要的比较而后才决定取舍的。读者会发现，由于体裁（如乐府、古诗，五言、七言，律绝、古风）、时代（如唐诗、宋诗）、流派（如“建安”“正始”，“江西”“江湖”，韩孟与元白，盛唐的“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风格（如杜甫的沉郁顿挫与李白的飘逸奔放，郊寒岛瘦与元轻白俗，李商隐的深情绵邈与杜牧的明朗俊爽）、艺术方法（如写实与幻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描写手法（如比兴、衬托，直陈其事与意在言外）、意境（如空灵高华、浑灏苍茫、朴拙奇崛、幽僻冷峭等）的种种不同，同一题材和主题的诗篇会呈现万紫千红的面貌和千差万别的丰采，值得加以分辨和体认。比如列于“爱情家庭”类“爱情”目的三篇清人作品，就大有比较玩味的余地。黄景仁的《感旧》（四首）是严谨的七律，写的是已经逝去但仍使人梦牵魂萦的纯真爱情生活，表达的是李商隐式“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幽缠悱恻、低回反复的感情波涌。它没有印上太深的时代痕迹，而纯然以探索感情世界的幽闭角落和捕捉感情自我闪烁的星星火花为目的，显得极为含蕴内向和深情绵邈。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选五首），其形式是灵活的七绝，其情绪是开放型的。作者不但力求自我抒发，似乎更想感染他人。它写的是与妓女的一种特殊的爱情，带

着世俗的色彩，但却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变革、身世愤激的印记。虽然有时亦作缠绵低回，但统一的风格却是“亦狂亦侠亦温文”，哀艳中杂雄奇，颓唐中显奋进，箫心剑气兼具，幽美壮美并存，无论体裁、风格、手法、意境乃至客观的社会意义都与黄景仁《感旧》迥然相异。而黄遵宪的《山歌》（选三首），是以“客家山歌”的形式，以清澈悠扬的民歌风格来描摹农村小儿女的相思情态，与刘禹锡的“竹枝词”一脉相承。诗情盎然，一派天籁，诗意明朗显豁却又温婉有致，风度绰约，极富生活的意趣，与上述两篇又自不同。读者不难从这样的比较中了解诗意的多侧面和获得审美的立体感。

对于一部类诗选本来说，编注者应当自始至终贯彻这一“比较”的原则，也不妨说这一原则便是全书的灵魂。但由于水平所限，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很好，有时或许做得不好。

所谓“欣赏性”，即是帮助读者欣赏入选的作品。我们的读者都想通过这部书来吸取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营养滋润，得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享受。欣赏，在文艺学中意味着主客观距离的缩小，也就是欣赏主体对于欣赏客体准确而又深入的领略和把握。由于古人的时代去今已远，不要说古代的词语、典章制度、文献名物等对于今天的读者有所隔膜，就是古人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与今天也有不小的差距。加上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从来不提平直浅露，而相率以蕴藉含蓄、兴象宛转、意在言外、无迹可求为高，这就造成了今天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欣赏上的主客观间隔。为此，我们尽可能在这方面做一些缩短距离的努力。全书每首诗的第一条注释，都对该诗的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作详略不等的分析，采用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也时杂己意，虽不能首首都说得鞭辟入理、深中肯綮，但相信对读者的欣赏亦不无小补。

所谓“历史的连贯性”，实际上是文学史的概念，指的是各种体裁和多种题材的诗歌作品都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类诗选本应在可能范围内要而不烦地给以体现。以诗歌体裁而言，四言诗起源于《诗经》，后世写四言诗的人虽然不多，但亦不无继承。五、七言诗则各有起源、发展、变化的过程。五言诗，最早见于《文选》的是苏武李陵赠答诗，但经考证，苏李之名乃系后人伪托，在苏李生活的西汉前期，还不可能出现如此成熟的五言诗。五言诗当起源于东汉。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及建安七子等的五言之作，才将五言诗推向了壮大成熟。但这还是就五言古诗而言。至于五言律诗，自齐梁间出现“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永明体”，到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同样，谈七言诗的起源，不能不首先注意到柏梁台的联句和曹丕的《燕歌行》。本书不是以体裁分类，所以这方面或许难以明显体现。但本书收诗兼及各种体裁，不论诗经、楚辞，乐府、古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民歌、民谚，乃至平时选本较少涉足的杂言、排律等，都在考虑入选之列，也多少保存了这方面的用意。

同一题材的诗也会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如“田园”题材，陶渊明是最早的大家，中经宋齐梁陈隋而至于唐，便出现了王孟储韦的山水田园诗派，成为盛唐的大宗。发展到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等田园之作，又呈现了与前不同的内容和风貌。其间质文代变，推陈出新，既有始作俑者、发扬光大者，也有继踵追武、新变代雄者，难以一一枚述。如果“田园”类目的选诗能够清晰地画出这样一条题材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虽然不可能提供研究工作者所需要的全面丰富的材料，但至少也给读者指出了一条学习文学史的寻径觅途的线索。

所谓“一定的工具性”，不言而喻，就是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名篇、名句。在这方面，我们尽可能多蒐集一些同类的优秀作品，做到“点面结合”：既有名篇佳句的精采，又具数量质量上的丰满。名篇、名句虽因其本身思想艺术达到比较完美的统一而为历

代公认，但与社会时代的需要亦不无关系，入选、引用一多，便逐渐“成名”。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本来不算有名，但经《高山下的花环》引用，便一时风靡天下，现在即使要把它排除在“名句”之外亦已不可能。选诗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这一起伏消长的关系，而加以必要的尊重。

又如选“美女”目的诗，《诗经·卫风·硕人》的“螓首蛾眉”与汉李延年歌的“倾国倾城”，那是缺一不可的。而乐府《陌上桑》侧击旁敲，完全避开了正面描写，便烘托出采桑女罗敷的明艳绝伦，这是艺术手法的创新，与“沉鱼落雁”、“闭花羞月”虽同出一辙，却更浑成自然。只可惜曹子建的“洛神”是赋不是诗，碍于体例，不便入选；他的《美女篇》限于篇幅，只能割爱。而我们在“美女”目中却加入了杜甫的《佳人》，可能这样做有人会不以为然，但只要想一想“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这两句诗对于后世描写幽怨莫名的大家闺秀形象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连《红楼梦》潇湘馆里的林黛玉都隐约着这种神韵，也就不必苛责编者了。最后，我们在这一目中加入了吴梅村的《圆圆曲》，不管吴三桂引狼入室是否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其中刻画一代名姬陈圆圆不同时期的形象，确实是笔墨酣畅淋漓，风姿绰约摇曳，楚楚动人，我见犹怜。以之为“压轴”，当亦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再如咏牡丹诗，罗隐的“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是名句。它之所以有名，当与《红楼梦》将“任是”句奉送给了冷艳的薛宝钗有关，但不少《红楼梦》的读者或许不知道这句诗的作者与出处，我们选了，读者要查找也就方便了。同样咏牡丹，唐李正封有“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的名句。缩写便成了“国色天香”。见于《唐诗纪事》卷四十的，仅此两句，未录全诗。我们不好入选，只好在“牡丹”目的有关注释中给以说明。这类例子较多，相信对于并非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各行各业

的读者会有一定帮助。只是由于全书容量的限制和其他一些客观原因，这方面不可能求全，所以加上“一定”二字，也请读者诸君不以求全责备。

本书选诗在二千七百首以上，本来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归类列目的结果，仍然出现了有些类，如鳞介虫鱼、器用饮食、咏史怀古等类中的某些目不很丰满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咏物诗好诗不易求选，与其滥毋宁缺，而咏史怀古诗本来很多，但由于分类的关系，有些诗归入了其他的类目，致使此类目的诗相对地减少了。

为什么本书中有的诗会出现这种类属两可的现象呢？原因是我们的分类兼采了按题材划分与按主题划分两个标准。象“天象自然”、“江河湖海”、“山川田园”、“四时寒暑”等的划分，采用的是题材标准；而“民生疾苦”、“忧国伤时”等则是采用主题标准。这样，有的诗，如杜甫的《春望》，据题材可以编入“四时寒暑”类“春”目，按主题则可归入“忧国伤时”类“忧国”目。这种逻辑概念上的两属现象，本来在发凡起例时应当避免，但我们明知之而故犯之，原因就是因建立“忧国伤时”、“民生疾苦”等类目，古代的书、类诗均无其例，而这类主题的诗篇许多都是古代文化中的精华，应当予以立类突出。例自我开，亦无不可；作法自缚，其法何益？所以我们将《春望》一诗编入“忧国”目，宁可顾此而失彼，弃小而取大了。

本书限于编者的水平，一定会有不妥或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编注过程中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室资料室和韦向学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书蒙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题签，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先生赐序，谨此衷心致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于桂林

凡 例

按题材分类编纂诗歌，这本是我国古代诗歌总集、选集和别集的传统编纂方式之一，自有其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阅读、使用的价值。由于时代去今已远，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变化巨大，古代以“分门别类”、“类聚”、“类苑”等为名的诗集，于今天已不尽适用。为满足现代读者的需要，我们参酌古代类书、类诗的类目，根据客观的要求和可能，除芜去杂，删繁就简，间立新类，变通体例，厘定为二十二大类、三百三十四细目，共编入各种体裁和题材的古诗二千七百三十余首。本书之编选于古虽然有据，在今则事属草创，发凡起例，颇费斟酌，兹作说明如下：

一、本书供读者学习、欣赏和查阅古代诗歌遗产之用，可于依类相从的编排中进行比较、鉴别和获得该类诗作历史演变的一般知识，力求归类收录历代名篇，便于检索、引用。因此，本书在编选时尽可能注意到比较性、欣赏性、历史连贯性和一定程度的工具性。

二、本书尽量采选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较佳的作品。但因本书有供查找引用的性质，又需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补立类目，并照顾到时代、作者的适当比例，故也酌情收入了一些虽非名篇，但题材稀有的作品。这类作品以内容健康，无病态、畸形表现而具一定参阅价值为入选准则。

三、本书入选作品，止于清末。已入民国的作者，如康有为、章炳麟等，只选其辛亥革命以前的作品。

四、本书不收小说、戏曲中的拟作；历代民歌、民谣酌情

选收,但明清民歌一般以俗曲形式出现,故未予入选。

五、本书限于篇幅,又需照顾到可读性,故某些篇幅过长、又比较深奥而注释费词的名篇,如屈原《离骚》、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未予收录。

六、本书的分类,有的依据题材,有的依据主题,兼采两种标准。咏物及叙事诗,一般以题材归类编目,如白居易《琵琶行》归于“文学艺术”类“音乐”目,《长恨歌》归于“爱情家庭”类“爱情”目。咏怀抒情诗,则以主题思想分类归目,如杜甫《春望》归于“忧国伤时”类“忧国”目。主题思想较复杂,类目归属几可者,择其主要者从之。抒情咏物兼具的作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以“楼”为题的作品,题目中有“登楼”的,归入“抒怀言志”类,其它则归入“官观楼室”类。

七、本书篇幅有限,类目及选诗均不可能包罗万象,故某些类目只具一定的示范性。如历代干谒诗汗牛充栋,而于今天读者并无多大意义,本书于“干谒”目中仅选录两篇,示例而已。

八、一题数首或多首,而题材内容各首又不尽一致者,如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龚自珍《己亥杂诗》等,能分则分,列于不同类目;不易分列者,择一而从。

九、各类目收诗数量不求平均,凡有二首以上,即列为一目,仅一首者列入该类“其他”目。

十、每一目中的作品,均按作者时代和生年先后排列。部分生卒年不明的作者,其作品列于该朝代作品之末。

十一、为了广大读者阅读方便,本书对入选诗篇均作较详细的注释,力求注清难词、典故,并串释难句句意。注释一般不避重出,以省读者翻检之劳,其详略程度则视具体需要而定。

十二、本书每首诗第一个注码的注文亦作题解之用,或交代作品的背景,或阐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视作品的具体情

况，或详或略，或重点阐发某一方面，以帮助读者理解诗意、进行欣赏为目的，不求面面俱到。

十三、本书对入选作者均作简明介绍，见于该作者第一次出现的作品下；以后重见者，则注明参见页码，以便翻检。

十四、本书对入选作品的作者真伪诸问题，一般不作考证，均采用通行说法；或兼存两说，于注文中说明；如有己见者，则阐明理由。

十五、本书选录原诗，尽量采用善本及今人校点本，力求准确。遇有异文，无关紧要者不一一注明，若有关碍，则注明“一作×”。

十六、鉴于目前各种古诗选本对原诗进行标点无一定标准，往往芜杂不清，故本书标点原诗不采用引号、书名号和分号，一般只用逗号和句号，问号、感叹号等也尽量少用。

十七、原诗若有序文，视情况采用如下几种方法处理：或全录于诗前，或移作注文，或删却不录。已录者一般只作简注。原诗的作者自注，一般收入注释中，并加以说明。

十八、本书编注参考了一些类书、类诗和各种选本，吸取了今人的许多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注明，特此衷心鸣谢。

本书简介

本书共四册，上起《诗经》，下迄清末，精选历代诗歌二千七百三十余首，分为“天象自然”、“江河湖海”、“山川田园”、“四时寒暑”、“岁时节序”、“花草果木”（一、二）、“飞禽走兽”、“鳞介虫鱼”、“宫观楼台”、“器用饮食”、“文学艺术”、“百工农商”、“古今人物”、“战争军旅”、“忧国伤时”、“民生疾苦”、“羁旅行役”、“交游赠答”、“抒怀言志”、“爱情家庭”、“咏史怀古”二十二类，三百三十四目。

与其他诗歌选本比较，这种按题材分类分目编纂诗歌的选本，能够较好地照顾到诗作题材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从中可以窥见我国古代诗歌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无所不包的特色，同时还便于进行类比，了解同一类作品不同的思想角度和艺术手法，又方便按类索诗，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和保存。

本书附有作者简介和详细注释，适合各方面读者阅读。

古 诗 类 编

总 目 录

序.....	王运熙 (1)
自序.....	(1)
凡例.....	(1)
总目录.....	(1)

第一册 (类: 6; 目: 68; 首: 712)

一、天象自然 (一百一十首)

天 (三首)	(3)
日 (八首)	(7)
月 (十三首)	(15)
星 (四首)	(30)
云 (七首)	(35)
风 (十一首)	(40)
雪 (十六首)	(52)
雨 (十四首)	(68)
晴 (十四首)	(81)
雷 (四首)	(92)
雾 (五首)	(96)
霜 (四首)	(101)
露 (三首)	(105)
其他 (四首)	(108)

二、江河湖海 (一百三十八首)

江 (十七首)	(117)
河 (八首)	(131)
湖 (十八首)	(139)
海 (十首)	(155)
溪 涧 (十二首)	(164)
峡 (八首)	(173)
池 塘 (七首)	(181)
滩 (六首)	(186)
潮 (九首)	(193)
瀑 布 (六首)	(201)
泉 (八首)	(207)
水 (七首)	(214)
洲 屿 (五首)	(220)
桥 (四首)	(224)